科学导报
2025年7月11日 星期五
责编：郑 婷
投稿：kfqjszk@163.com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平安阜阳

■ 李 康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深刻把握核心要旨，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努力建设平安阜阳。

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对平安阜阳建设的重大意义

行之有效预防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迫切需要。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就业、拆迁、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生产事故是平安建设中经常遇到的风险挑战，都需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去发现去防范去调解，在法治框架下解决矛盾纠纷。

构建平安社会是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是“枫桥经验”产生的文化基础，尊崇礼让、以和为贵的精神内核让“枫桥经验”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安徽六尺巷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依靠和发动群众实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矛盾不激化，问题不上交”的良好局面，营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加快建设“三地一区”“十个区域性强市”的重要保障。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安全。阜阳处于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大有可为”关键期，阜阳要主动靠上去、精准接上去、全力融进去。作为长三角和中部地区发展的双桥头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阜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纵到底、横到边”民声呼应体系，构建起投资环境优的产业转移新高地。

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平安阜阳的科学内涵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就要运用好群众路线这个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规律，发挥广大群众发现矛盾的敏锐性和解决矛盾的能动性，依靠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实现社会治理中党的领导地位与群众主体地位的高度统一，完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机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水平，实现高水平安全。

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枫桥经验”从产生到推广，从不断发展到持续升华，都体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维导向。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要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运用好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家庭和睦。

社会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基层安全是社会安全的保障，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基层是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的落脚点，也是化解矛盾、疏导冲突的主阵地。通过为民服务中心、接诉即办工作中心等，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将基层群众喜怒哀乐放在心上，主动分析风险点，提前介入矛盾过程，让矛盾纠纷早处理，发挥预警、防范、控制和调解作用，把问题消弭在萌芽状态，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平安阜阳的实践路径

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网格化管理在城乡社会治理的创新和运用，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全领域、全过程、全环节。依托网格开展日常排查走访，为民办事，宣传乡规民约，引导群众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格管事是“四事四权”工作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划分村（社区）网格，把党建、综治、信访等各类网格统一整合成“一张网”，将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群团组织人员等纳入网格员队伍，通过持续广泛的走访，及早发现群众的急难愁盼，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矛盾的滋生和恶化。网格管事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按照“数据采集-初审-处理-督办-反馈-评价”工作机制，实现基层信息在网格收集、基层隐患在网格排查、基层矛盾在网格化解、基层事务在网格办理、基层服务在网格实现，有事“网”里办，小事不出“格”，基层治理扁平化、无盲点，构筑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格局。

完善“纵到底、横到边”的接诉即办高效工作机制。做好接诉即办工作是衡量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要指标，接诉即办工作的效率关乎地方政府的形象，关系营商环境与基层治理水平。“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阜阳依托接诉即办工作中心（民声呼应中心）整合线上+线下等多个民意表达渠道，完善民声通道间共享机制，理顺事权明确职责分工，实现群众诉求多口收集、“一网通办”。推动各平台开放数据接口，实现信息双向流通，促进信息共享，把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变成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理顺事权明确职责分工，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网上有人看、网下有人办。完善联合办公机制，加强市、县（区）、乡镇、村四级接诉即办沟通协作职能，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打通工作堵点，形成市、县、镇、村保障民生工作合力。

激发群众活力构建多元调解体系。充分发挥基层自治作用，尊重基层群众自治权，提升群众参与基层治理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群众真正实现对身边事当家作主，群众诉求发现在基层，解决在基层，让更多群众在社会治理中体现价值。做好群众法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纠正群众思想上的错误认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群众拒绝“等、靠、要”，依法、有序、理性表达诉求，维护权益。综合运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针对群众不同诉求有效展开调解，解决群众的问题，化解不安定因素。

基金项目：该文系阜阳市2024年度社科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FSK2024028）。

（作者单位：中共颍东区委党校）

以小见大的历史叙事

——评刘东儿童小说《回家的孩子》

■ 王静雯

《回家的孩子》是大连作家刘东于2023年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运用小说体裁真实描绘了发生在大连的抗战故事，小说以1945年日占时期的大连为背景，以唐生与田仲男的成长经历为线索，描绘了山蕲堂一家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隐秘抗争，展现出日本侵略者在大连展开的对中华文化根基的系统性摧毁。作品首次正面表现大连人民反抗奴化教育的过程，通过儿童视角展现文明对抗的静默战役，在没有硝烟的学堂内展开民族精神的守护。刘东以细腻笔触串联起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实现了宏大历史与微观经验的有机融合，赋予儿童文学以厚重的历史质感与现实意义。

一、小人物大精神：个体成长与民族命运的互文

刘东以人物为故事出发点、以儿童情感与思想认识转变为轴心，将儿童置于历史的中心与重心，以成长追寻为叙事动力，使得宏大复杂的历史轻松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小说以唐生的隐秘身份为故事起点，作为抗日遗孤，唐生在日据大连的殖民教育中面临身份认同的困惑与成长的挑战。唐生对待日语的态度从“情绪化反抗”到“理性抗争”的成长轨迹，他的成长轨迹与田仲男等少年的抗争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一幅“少年觉醒图”——即使身处绝境，依然有人选择用知识武装自己，用智慧对抗压迫。这一转变既反映出了唐生对个人命运的挣扎，也折射出民族苦难与抗争的深层逻辑，同时也象征着被压迫民族通过文化转译寻求精神抵抗的路径。

与唐生并行的田仲男成长线，则聚焦于少年在体制内部展开的集体抗争。田仲男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秘密组织学生反抗奴化教育，策划并领导“水涧堡事件”。即使最后事件败露，以田仲男为首的向明义、郑大年被捕入狱，面对酷刑坚贞不屈，他们完成了从觉醒者到殉道者的精神升华。在和平年代，青少年虽不再需要面对外敌入侵，但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同样需要这种勇于担当、坚守信念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小说中田伯男从军殉国、唐生抵抗奴化教育、田仲男领导抗争、向明义血洒狱中，真实历史中的刘蓬川、何汉清，则以生命书写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争史。刘东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将抗战具象化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历程，通过这些角色，民族精神得以聚合，文化信仰得以延续，少年视角得以上升为家国意识的承载体。刘东的小说不仅是对英雄事迹的书写，更是在个体叙事与集体精神之间架起的一座桥梁，我们不仅能感知到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和抗争，更能触摸到整个民族在苦难中的觉醒与成长，那些消逝的英魂不仅属于过去，更应铭刻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之中，成为激励后人的精神灯塔。

二、小事件大历史：局部叙事中的时代镜像

《回家的孩子》以田家一家人的命运为线索，将抗战时期大连的社会现实与历史背景巧妙融合，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微小事件的叙述，勾勒出一幅殖民统治下文化压迫与民族抗争的宏大图景。作品中的诸多细节看似琐碎，却在文学化的再现中凸显了历史的真实质感与时代的深刻动荡。

从1905年日本军事占领大连至1945年战败撤离，这片土地经历了长达四十年的文化阉割工程。在殖民教育体系中，日语被冠以“国语”之名在中国实施语言殖民，而汉语则降格为“满语”沦为文化附庸。通过纵火焚毁私学、暗杀塾师等极端方式剿灭民间私塾体系。在这场持续两代人的文明保卫战中，教育场所沦为没有硝烟的前线，“华”“夏”等汉字被列为禁忌符号，中国孩童要么沦为文化弃儿深陷蒙昧沼泽，要么在殖民课堂接受精神置换手术。《回家的孩子》中所展现出的那些看似虚构的情节，实则是用文学剖开真实的历史。

刘东用了25年筹划这部作品，为了确保作品的准确性和深度，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准备。刘东自述在筹划小说期间，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档案，走访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大连老人，向研究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推行奴化教育的专家学者咨询请教，与抗战英雄后人共同追溯历史足迹，还深入研究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社会制度、教育政策以及民众的生活状态等内容，为小说中历史场景的构建和历史事件的描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小说不仅具有文学性，也具备史实考据的厚度，通过小人物的遭遇、小事件的叙述，让宏大历史得以贴近现实、深入人心，使读者在微观叙事中感受到时代的厚重与民族的韧性。正是在这些被“以小见大”嵌套起来的叙事片段中，《回家的孩子》完成了对民族记忆的文学建构，使一段关于殖民教育与文化抗争的历史，不只是课本上的事实，而成为可以理解、可以反思的精神经验。

三、小主题大内涵：儿童文学中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觉醒

在《回家的孩子》中，刘东借助“回家”这一看似温情的主题，承载了对民族认同、文化归属以及教育功能的深层反思。小说通过唐生与田仲男的成长历程，将个体经验与国家命运、儿童意识与文化觉醒紧密交织，使“小主题”具备“大内涵”，实现了儿童文学少见的思想深度。

“回家”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不仅指向唐生从身份迷失到文化认同的过程，也象征着国家与民族从殖民统治下的沉沦走向精神上的归返。在小说中，田仲男与唐生二人的成长线都是“回家”，唐生身为田家的子孙，因身份原因即使身在田家，仍然不是真正的“回家”；而田仲男在校园内暗地抗日的行为也是为了“回家”，两位主人公的故事线并列而行，最终回到小说所要表达的内涵——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小说中除了以主人公成长脉络为表达，故事发生的起点“山蕲堂药店”也是作者置于故事中的隐秘表达，当日本战败，“山蕲堂”改名为“当归堂”的细节，正是主题深化的象征表达。“当归”既是药材名，也寓意着回归本源与民族自信的重建，这种富有文化意味的转化，使“家”的概念超越血缘与地理，升华为文化与精神的认同场域。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回家的孩子》在探讨奴化教育问题的同时，也向读者提出了关于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的深层思考。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传承性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小说中枝子这一日本孤女设定，以及正义的朝鲜警察老金，打破了敌我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为儿童读者展现了人性在极端处境中的光辉，构成了殖民统治下特殊的互助图景。这种精神在田家收养战败后的日本女孩枝子的情节中达到高潮，中华民族以“化干戈为玉帛”的胸怀，同时也回应了全球化语境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学化表达，这种超越民族对抗的深层含义，拓展了儿童文学对战争记忆的包容性与教育意义。

刘东并未将抗战题材局限于对敌愤怒或英雄赞歌，而是将儿童视角作为探讨民族文化传承的切入点。通过“家”这一微观单元，探讨的是国家的归属感；通过“成长”这一生命历程，映射的是文化自觉的可能性。刘东不仅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的成长故事，更通过个人命运的书写，映射了整个民族的抗争，小说既是对奴化教育的有力批判，也是对民族觉醒与文化自信的深情讴歌。

《回家的孩子》以“回家”为核心意象，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个体成长与民族命运的交汇，成功实现了“以小见大”的叙事追求，这种将宏大历史命题转化为具象化文学符号的创作智慧，既保持了历史反思的思想深度，又符合儿童文学的审美规律，借儿童成长的视角折射历史洪流的壮阔波澜。《回家的孩子》不仅是一部讲述抗日历史的儿童文学作品，更是一扇窗口，让孩子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既能感受到那段烽火连天岁月的艰辛与伟大，又能在心灵深处种下爱国与和平的种子。它像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让历史的智慧与力量，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激励着他们成为有责任感、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基金项目：2024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合作课题“新世纪辽宁地区劳模精神的影像化传播研究”（课题编号：2024lslqnhzkt-14）。

（作者单位：大连大学美术学院 指导老师：刘博）

律动中的科学：音乐如何协同优化运动表现

■ 王青圆 宋欣云

音乐，这一跨越千年的艺术形式，早已悄然渗透进人类运动的基因序列。从非洲部落的狩猎鼓点，到古希腊奥运会的长笛伴奏；从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号子，到现代健身房的动感节拍——人类始终本能地将韵律与身体动作交织。如今，这种古老联结正经历科学化的深刻蜕变。随着神经科学、生物力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突破，音乐已超越传统认知中的“精神激励剂”，成为运动科学领域极具前景的非药理性干预手段。大量实证研究揭示，音乐通过同步调节人体多层级生理系统与心理过程，在代谢效率优化、神经控制强化、情绪能量唤醒等维度形成独特协同效应，使运动表现获得系统性提升。这种协同机制如同精密的生物交响——听觉信号转化为神经电脉冲，驱动心血管节律重组；旋律情感激活边缘系统，重构认知资源分配；最终通过皮层-基底节环路的深度整合，实现身体机能与心理能量的共振放大。当我们解码这些声波与生命体的对话密码，不仅将重塑运动训练的科学范式，更可能开启人类潜能开发的新维度。

一、生理优化：节拍如何重塑身体机能

当音乐节拍与运动节奏同步时，人体会启动独特的能量调节模式。这种同步性如同为身体安装精密的节拍器，引导心血管系统进入高效运行状态。例如在耐力运动中，当跑步步频与中等节奏音乐形成稳定共振时，自主神经系统会调节心率趋于平缓，摄氧过程更为经济，这种内在调节使机体能量分配模式发生根本性优化。其核心机制在于音乐节拍对脑干网状结构的规律性刺激，该区域作为神经系统的“节律中枢”，能抑制交感神经的应激性亢奋，减少因紧张导致的能量空耗。值得注意的是，快节奏音乐对动作模式具有重构作用——赛艇运动员在特定节拍引导下，肌肉收缩与放松的时序控制更为精准，代谢副产物的清除速率加快，从而推迟疲劳感的实质性出现。而在竞技高压环境中，舒缓的古典乐通过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功能状态，降低压力激素的分泌峰值，这种生化调节使运动员在关键决策时刻保持神经系统的敏锐度。更值得关注的是，音乐对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双向调控能力：激励性旋律促进内源性阿片肽释放，提高疼痛感知阈值；团队运动中的同步音乐则激活催产素分泌通路，这种“信任激素”成为群体协同作战的隐形纽带。

二、心理赋能：注意力与情绪的双重革命

音乐对心理系统的重构展现出多维度价值。在认知层面，其核心功能在于注意力资源的战略转移——通过将意识焦点从内部生理信号（如肌肉酸胀、呼吸窘迫）导向外部音乐元素（旋律走向、和声变化），有效打破“疲劳感知-焦虑加剧”的恶性循环。这种认知策略在神经层面具有明确表征：脑电图监测显示音乐能选择性抑制前额叶特定频段的电活动，该频段正是大脑编码不适感的核心通道。神经耦合现象则体现音乐对运动控制的高级优化：当动作节奏与音乐重拍形成时间锁定，听觉皮层与运动皮层之间产生显著的信号同步效应，这种跨脑区协作如同为运动神经回路配置了生物导航仪。花样滑冰运动员在完成三周跳时，常利用音乐高潮段落的重拍作为动作触发器，正是这种神经时相锁定技术的精妙应用。情绪维度上，音乐展现出强大的情感重塑能力：积极旋律通过激活伏隔核等奖赏中枢，释放多巴胺神经递质，这种神经化学变化直接转化为“继续坚持”的行为动力。更为深刻的是音乐对自我认知的重构作用——当运动员在训练中反复将突破性表现与特定音乐建立联结，这些旋律会成为提取成功记忆的感官密钥，在竞赛关键时刻唤醒“我能胜任”的信念体系，这种心理资本往往成为决胜的关键变量。

三、协同效应：身心联动的增效闭环

生理与心理系统的交互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多层次整合形成自我强化的增效回路。在能量代谢维度，音乐干预建立“生理舒适-心理积极”的正反馈：降低代谢废物积累减轻身体负担→诱发愉悦情绪→增强运动坚持性→进一步提升代谢效率，这种循环如同为运动系统安装了性能增强模块。神经可塑性研究则揭示更深层机制：规律性节奏刺激能激活前运动皮层的镜像神经元群，该神经细胞集群是人类模仿学习的关键物质基础。针对特殊群体的实验显示，持续性节奏训练可优化神经通路的传导效率，改善动作协调能力。在群体动力学层面，音乐的同步效应创造独特的“社会神经内分泌场”：当团队成员动作在统一节拍下趋同，不仅催生信任激素的集体分泌，更触发大脑默认模式网络的特殊激活状态，这种神经生物学变化使团队进入高度协同的“心流”状态，传统龙舟竞技中鼓手的核心价值正源于此。

四、关键变量：个性化适配的黄金法则

音乐的运动增效效果呈现显著的情境依赖性。音乐属性本身存在精细的“效能光谱”：中速节奏音乐通过稳定心呼吸耦合提升耐力表现，而爆发性运动则需要快节奏驱动神经肌肉兴奋阈值；器乐作品因避免语义加工的资源竞争，较声乐更利于动作专注度的深度维持。个体差异维度更具复杂性：遗传学研究显示特定多巴胺受体基因型人群对激励音乐的响应更为强烈；训练水平构成关键调节因子——业余运动者获益显著而精英运动员主要在环境应激条件下显现效果；文化背景则塑造独特的“音乐-运动”认知图式，例如东亚武术中的器械演练常以太鼓节奏作为力量传递的时空坐标，这种文化特异性适配尚未被现代训练体系充分转化。生命周期视角同样重要：青少年群体对节奏变化的神经可塑性响应优于中老年群体，而老年康复训练中音乐的记忆唤起功能具有特殊价值。

五、智能未来：科技重塑运动音乐体验

生物传感技术正在重新定义音乐干预的精度边界。新一代智能运动装备通过肌电传感器捕捉肌肉激活时序，结合惯性测量单元的动作捕捉，实现音乐节奏与生物力学参数的毫秒级匹配。这种实时反馈系统不仅优化运动经济性，更通过建立“动作-听觉”的条件反射加速技能自动化进程。虚拟现实技术的介入开创多维训练空间：将音乐律动转化为可视化能量轨迹，使运动员在沉浸式环境中体验动作与声波的共振效应，这种多感官整合显著提升神经适应效率。基因组学的发展则指向个性化定制新纪元——通过分析多巴胺通路相关基因表达谱，构建音乐响应预测模型，为不同遗传特质人群设计专属声学激励方案。人工智能更在群体训练领域展现潜力：通过分析团队成员的生物信号同步度，动态生成促进群体协同的复合节拍，这种“数字指挥家”系统可能重塑团体运动训练范式。

然而前沿突破伴随深层挑战：音乐对基底节等皮层下结构的调控机制仍是未解之谜，需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提供神经环路层面的新证据；跨文化音乐效能的比较研究存在方法论困境，特别是口传心授的传统身体技艺如何与现代声学分析框架对接；伦理边界的界定更引发持续争论——当基因编辑技术与智能音乐系统结合，是否创造新的竞技不平等？国际体育组织正着手建立音乐辅助的技术伦理评估矩阵。

六、结语：从经验辅助到科学处方

音乐优化运动表现的深层逻辑，本质是建立生理节律、心理能量与神经可塑性的三重协同网络。在这个动态系统中，每个音符都成为调节生命活动的生物信号：声波振动经耳蜗转化为神经冲动，通过丘脑“中继站”同步激活自主神经系统与边缘系统；多巴胺通路在旋律高潮时点亮奖赏中枢，将疲劳阈值推向新边界；而镜像神经元群的节律性激活，使身体在无意识中模仿音乐的力学结构。这种融合不仅改变运动表现提升的技术路径，更在哲学层面重塑身心关系的认知范式——当《命运交响曲》的强音与百米起跑的爆发在神经突触层面同频共振，人类终将理解：身体不仅是运动的执行者，更是与宇宙节律共鸣的能量载体。在科学与艺术的交汇处，突破生理极限的密码，或许就藏在生命自带的韵律基因之中。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遵义会议：系列会议铸就的伟大转折

■ 张武波 刘海霞

2025年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的时间节点。由于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学界的纪念性文章多见报端，其中多将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视为遵义会议的全部。这一狭义认知容易让人产生伟大转折是一蹴而就的错觉。事实上，从通道会议开始，经过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这些会议在时间上相继发生，在内容上相互关联，在作用上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全过程。

一、遵义会议召开前的酝酿过程

（一）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彼时，红军刚刚经历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蒋介石已洞悉红军拟向湘西进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战略企图，迅速在湘西一带集结重兵，妄图将红军一举围歼。在此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然而，博古、李德深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无视战场局势的变化，固执地坚持按原计划进军湘西。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未能就战略转移的方向作出决定。但是，通道会议为促进红军战略转兵，创造了良好条件，成为遵义会议系列的起点。

（二）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对红军战略方向作出重大调整，放弃原定向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确立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以中央决议形式否定了李德军事指挥权，明确了新的战略方向，并决定在攻克遵义后，系统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不仅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铺垫，更标志着红军实现战略转折的开端。

（三）猴场会议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于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猴场会议上，博古、李德仍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据理力争，坚决反对这一错误方案，主张红军转兵西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腹地进军。周恩来、朱德等多数同志纷纷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最终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明确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为创建新根据地的方向，并规定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作战方针等，这一规定实质上是剥夺了李德、博古对军事指挥的独断权。猴场会议巩固了黎平会议的成果，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进一步扫清了障碍，成为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节点。

二、遵义会议召开的过程

1935年1月7日，红军成功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为扭转危局带来了关键契机。在这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展开多次深入交流，从军事指挥、战略决策等层面系统反思“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张闻天依据与毛泽东等人商定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提纲》，该提纲为遵义会议批判错误路线提供了理论支撑，使党内高层在会前达成基本共识。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此次会议聚焦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成为党和红军命运的关键转折点。会上，博古作主报告，将反“围剿”失败简单归咎于敌人力量强大，试图为自身错误开脱。周恩来作副报告，深刻检讨“三人团”在战略战术上的重大失误，主动担责并直指李德、博古的错误决策。张闻天则直击要害，系统批判“左”倾军事错误，为会议定下纠偏基调。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结合长征以来的实际战况，深入剖析第五次反“围剿”战局，准确地指出其失败的关键在于军事指挥层面的失误，以及具体的战略战术失当。王稼祥坚定支持毛泽东与张闻天，明确提出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力主由毛泽东指挥红军。朱德、刘伯承等多位将领也纷纷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张闻天的报告。会议争论激烈，最终多数人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

鉴于局势变化，会议调整战略方向，放弃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川西或川西北开辟新根据地。在组织架构上，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剥夺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并明确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为最终决策人。

遵义会议聚焦军事指挥与组织领导两大核心问题，实现了党和红军领导权的重大转变。它不仅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三、遵义会议召开后的完善过程

（一）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鸡鸣三省（位于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处）一带开展分工调整工作。经审慎研讨，会议决定由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同时，明确毛泽东担任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协助者。这一安排巩固了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成果，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二）扎西会议

张闻天上任后，于2月6日至9日在云南威信县扎西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等一系列文件，会议还根据实际情况对红军战略进行调整，决定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扎西会议将遵义会议的决议落到实处，展现了新领导集体的灵活应变能力，为红军在后续战斗中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三）苟坝会议

1935年3月10日召开的苟坝会议，针对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四周敌人兵力强大，红军进攻易陷入重围，所以坚决反对这一计划，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意见起初未被多数人接受，但他力排众议，最终说服中央改变计划。为实现军事指挥的高效与统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任务。这一机制既保证军事决策更加高效、科学，又防止个人专断，也从组织上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四）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规定在根据中央政治局方针处理日常工作时，“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就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使党的领导更加集中统一，是对遵义会议确立的正确领导体制的深化和完善。

遵义会议是一个由系列会议共同构成的伟大历史转折。在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回顾这一系列会议，便于我们深刻地认识遵义会议在革命危急时刻扭转乾坤的历史作用，领会其在党的领导核心形成、独立自主探索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里程碑意义。遵义会议所折射出百折不挠的信念、实事求是的态度、独立自主的勇气、团结统一的精神，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智慧与力量，这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陆军边海防学院基础部政理与政工教研室）